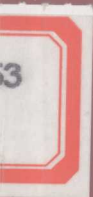


叩门集

Koumenji

Daijiazhenfangzhiwenxuan

—— 戴佳臻方志文选



方志出版社

叩 門 集

——戴佳臻方志文选

方 志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叩门集:戴佳臻方志文选/戴佳臻著. - 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7
ISBN 7-80192-235-2

I.叩… II.戴… III.方志学-文集 IV.K29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7083 号

叩门集——戴佳臻方志文选

著 者:戴佳臻

责任编辑:卫家雄

出 版 者:方 志 出 版 社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 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大楼 12 层)

邮 编 100732

网 址 <http://www.fzph.org>

发 行:方志出版社发行部

(010)85195814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法律顾问:北京市京诚律师事务所

印 刷:江西省地方志四方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8

字 数:206 千字

版 次: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1000 册

ISBN 7-80192-235-2/K·167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请及时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791)8195880

序

编修地方志,是大事;探讨方志理论,总结修志经验,是修志之中的要事。戴佳臻先生将编纂与研讨并举,达到理论和实践皆善。现在,他的方志文选正式出版,是大好事。我乐观其成,并应其写序之约,借以再续情缘。

新中国建立以后,正规而全面组织编纂地方志,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1981年秋,我与江西大学谢方正先生、江西省社科院尹湘豪先生,奉命代表江西出席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到达太原会场,发现高安县志办的同志,主动要求赴会来了。从此,我卷入了修志工作大潮,开始了与高安的联系。第二年,戴佳臻先生调入并主持高安县志编纂工作,聘我为顾问之一,访谈切磋增多,相互认识的程度同时加深。时至今日,二十多年过去了,佳臻先生主编完成《高安县志》之后,接着又参与主编了《江西省政协志》、《江西省旅游志》等书,还四出讲学,发表文章。真是个勤奋不辍,老而弥笃,成果丰硕,而壮心不已。这本方志文选,他命名曰《叩门集》,是出于谦逊,仍然以“半路出家”估量自己,其实,这位叩门求教的朝圣者,已经转化为登堂说法的教授师。然而,学术殿堂的大门重重,勇猛精进者才能逐一推开。由此看来,“叩门”的名称,又可以是不停地探索之意。

二十多年来,第一轮新编地方志工作大功告成,续修的任务已经提出,当前最急需的工作是总结经验,提升认识,完善新的方志学理论建设。大批出版的地方志,是检验得失的第一物证,许多参与修志的干部,是将修志经验升华到理论的最佳人选。他们于庆功之余,再坐冷板凳,静心反思,诚恳研讨,交流体验,必定比局外

人评说得更真切,估量得更准确。研究者检索资料,可以在使用志书之中发现其优劣长短,却难于从生产的实况中了解原委,往往理论层面的应该,在实施操作时不可行,原则法规的划一性,执行贯彻时会变成多样式。

遗憾的是,不少人没有做这件总结提高工作。有的地方,志书出版,志办即散;有的地方人员换班,新人不理往事;也有人对此缺乏兴趣,对理论研讨不愿参与。何况续志编纂之令已下,不得不紧张地赶期限,做中心工作,无暇顾及前车之轨迹。

人们记得,1994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重庆召开方志理论工作座谈会,对前此15年的方志理论建设作了全面评估,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几个存在的问题,如“基础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方志编纂技巧的研究”,这个判断十分中肯: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纪要指出,要加强方志学科建设,制订方志理论建设规划,“建设起无愧于我国时代的新方志学,为下一世纪方志事业的发展,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此目标明确,任务具体,抓住了统率方志编纂工作的纲领。现在,上一届新志编纂工作已经结束,不知方志理论建设问题解决得怎样,为编写续志奠定的基础坚实到何等程度。

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志学,编修地方志,无疑是要“与时俱进”,反映新时代的气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是坚持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古人尚且主张“事唯其宜,理唯其当”(陆九渊语),地方志的体例需适时更变,“例以义起”(章学诚语),现在修志当然更要实事求是,充分体现时代特色。封建时代,几无传播媒体可言,书籍刊印极少,所以想了解地方民情的人,只有细读地方志;因而地方志的内容也就古今俱载,自然与社会统包,期待它是一地的百科全书。现在的社会环境

截然改观,众多新闻媒体传播的资讯,难以数计的出版物所承载的社情,应有尽有,目不暇接,耳难悉听,有所谓“知识爆炸”的惊叹,决无地方志独尊的可能。下车伊始,即看方志,只能是古人的美谈了。面对今天的文化氛围,地方志的角色定位,亟待审慎推敲。

再说,地方志是“存史、资治、教化”的官修资料书,那么它就必须是模范地资治着“三个文明”建设、教化着今天的接班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要和谐、协调发展,还必须保持自然资源,优化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以,强化地方志书关于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大局的资料储存,是不容回避的要务。为此,重新检讨已有的建设工程,便是题中应有之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们始终是在社会实践中,不停顿地检验往昔,发现问题,弃旧图新。在这个永恒的游戏规则中,挫折对人的教化作用,绝不可低估。“失败是成功之母”,认识了问题所在,才可能寻求到解决方案。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凡是不顾一切大唱赞歌的时候,正是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因此,志书中对负面资料的忠实记录,实在不宜粗疏简略。

“盛世修志”,不仅是记录胜利成果,叙述丰功伟绩,还需记存失误与教训,警醒后人,谨防骄奢,不蹈覆辙。古今中外,没有绝对的太平盛世,昌盛繁荣与克服腐朽衰败同时推进,彼消此长,彼强此弱,旧的问题解决了,前进中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接续编修之中的地方志,恰当地记录这种矛盾运动的社会资料,让读者领悟这个社会发展规律,正是其“教化”效益的表现。

现时的社会生活异常丰富,多姿多态,对社会机体的考察与研究,也有繁多的侧面和领域,企图让地方志满足各行业取材的需要,绝不可能。它必然只能是响应时代呼唤,围绕主旋律,更明显地朝史书方向倾斜,将该地兴衰起伏的资料编织起来,借以在社会协调发展中发挥作用。

我们自己已有的修志经验还需继续总结提升,新方志学理论尚待完善充实。当此之际,读到戴佳臻先生的《叩门集》,得到的启迪至少有三点:一是加强方志理论建设,对续志编纂至关重要,须首先倾力进行;二是直接参与修志的同志,是理论建设的主力,这些同志最便于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判别长短,决定取舍;三是高扬自强不息精神,学无止境,尽力而为。佳臻先生退下岗位多年,而工作照旧进行,虽是半路出家,却顽强地边干边学,以达专精,身居高安,却活跃于全国志坛。他写的文章,有理论,有实际,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有解决问题的方案,甚至实例。书中所论《新编县志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几点思考》、《方志资料性说》、《方志概述纵横谈》、《提高方志的理论档次和学术气息》、《浅析 10 部县(市)志关于人民公社的记述》等等,都有普遍性的参考价值。

戴佳臻先生曾说:“提高方志理论档次和学术气息,应当成为修志者的一种美好的追求。”(《叩门集》第 116 页)实践者的这个心愿,定将化作丰硕的方志学成果。谨此为序。

许怀林 于江西师范大学

2004 年 5 月

目 录

序	1
---------	---

理论探讨

试述方志学的源流	1
黎锦熙在方志学上的继承和创新	44
方志资料性说	50
从《八蜡庙之例》联想到方志的存史价值	55
新编县志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几点思考	59
方志概述撰写纵横谈	67
方志大事记探讨	73
谈《人民生活志》的编写	82
《旅游志》记述景区景点问题的探讨	89

编纂实践

广征博采和专题研究	95
莫把“丁口”当“人口”	99
总纂《高安县志》的几点思考和追求	103
提高方志的理论档次和学术气息 ——编纂《高安市老龄志》的新尝试	111
修志期一统 留根寓意长	117
情难勒处尚闻香	120

志稿评议

试谈《沈阳市志·人口》在表现方法上的三大特色	125
《宜丰县志》的四个突破	130
浅析 10 部县(市)志关于人民公社的记述	133
关于人民政协入志问题的思考	

——浅析 11 部市县志关于人民政协的记述	141
-----------------------------	-----

■ 专题编写

江西旅游资源与赣文化研究	148
世纪之交回眸高安人文历史	154
苏轼来去筠州	166
苏轼的筠州诗作	175
试述明代瑞州浮赋问题	183
一九四一年的上高会战	191
《朱軾传》前言	197
《吴有训》后记	201
《高安风物》跋	203
胡耀邦祖籍世系源流考	204

■ 志余漫拾

传统的文化管理方式

——浅析中国古代的乡规民约	208
关于谱牒问题的思考	212
试论《史传三编》的成书	219
朱軾编修《坡山朱氏宗谱》浅析	227
史家的史德史识和史才	
——《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读后感	235
可贵的公仆情结 珍奇的历史碎片	243
难忘的一课	245

■ 附录

戴佳臻参与编纂的图书目录	247
戴佳臻撰写发表的文论目录	249
后记	253

试述方志学的源流

一、散见在清以前的方志论说

方志学理论的萌芽和发展与各个时期的修志实践密切相关,并随着修志事业的发展而逐渐走向成熟。方志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体系到清代才由章学诚初步确立起来。但是,清以前的不少学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适应方志编纂的需要,或对以往方志有所评议,或对自己主修的志书有所构想,发而为之论说,虽属片断,但都为后世方志学科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如今我们从历代志书的序、跋、凡例,以及史书和其他典籍中,常可见到这些闪光的论点,其所涉及的理论范围比较广泛,概括起来,有关于方志渊源、性质、功用、体例、章法、人才的探讨等六个方面。

一、溯其渊源

方志卷帙浩繁,它是如何发展演化而来,其渊源如何,向为方志学者所探寻。清代以前的学者对此看法不一,各言其是,概括起来,大致有二:

(一)方志起源于历史,由先秦时代史官的记录发展而来。最早提出这种见解的,是东汉人郑玄,他在《周官》注中,将外史所掌“四方之志”,释为“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檮杌》”那样的地方史书。宋代司马光从宋敏求纂修《河南志》和《长安志》出发,上溯到唐韦述撰《两京志》,然后将其源头追至西周史官职方、诵训,认为方志源头就在于此。他在《河南志·序》中说:“周官有职方、土训、诵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昭王知其利害。后世学者,为书以述地理,亦其遗法也。”李宗潜的《祥符州县图经·序》中也认为“地志起于史官。”南宋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也

讲：“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马光祖在《景定建康志·序》中也称：“郡有志，即成周职方氏所掌。”元代黄潜甫在《东郡志·序》中说：“南山宋公，以侍御史致政居滑州。滑领二县，而治白马，白马故东郡地也。公暇日阅前史及传记，得东郡事，参以旧闻，作《东郡志》十有六卷……潜窃惟……是以成周之制，职方氏掌天下之图，而道地图以昭王者，有土训之官焉。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而道方志以昭王者，有诵训之官焉。”明代龚用卿在《重刊辽东志书·序》中说得更明确：“志，记也。记其事以为鉴，史之流也。天下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他所说的“国”，就是指古代的诸侯邦国，所谓的“史”，就是指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

(二)起源于地理。我国最早的总结前人积累起来的地理知识、记载全国地理情况的重要著述是《山海经》和《禹贡》。《山海经》记载古代巴、蜀和楚国及其以外许多地区的40个邦国、550座山、300余条水道以及这些邦国中的地理状况和风土、民情、物产、祭祀、巫医、神祇、怪异等，还叙述了100多个历史人物的世系和活动。《禹贡》假托夏禹治水以后，将全国分为九州，作为区划，并在这一基础上，将州所在地区的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田等、贡赋、交通以及少数民族居住地等作了专篇记叙。因此，《山海经》和《禹贡》历来为修志学者所重视，有的并把它奉为方志渊源之所在。《隋书·经籍志》记载：“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唐代贾耽在进《海内华夷图》表中，自称：“谨令工人画《海内华夷图》一轴……并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国以《禹贡》为首，外夷以班史发源，郡县纪其增减，蕃落叙其衰盛。”明确地将源头首列《禹贡》。宋代黄裳请昭“秘省录《山海经》等送职方检阅”，后来书成《绍圣九域志补遗》，当是以《山海经》为主要源本。元代张铉在探索方志渊源时，亦把《禹贡》列为首位，他在《金陵新志·修志本末》中说：“古者九州有志尚矣，书存《禹贡》，周纪职方，

春秋诸侯有国史,汉以来郡国有图志。图志兼记言记事之体,自山川、物产、民俗、政教、沿革、废置、是非善变、灾祥祸福,无不当载。”明代田硕在《延平志·序》中说:“《禹贡》,志所由昉。”

二、究其性质

古代学者对于方志性质问题,历来认识不一。其主张和他们对于方志源渊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亦分为二种:

(一)认为方志是历史书。汉代郑玄就认为方志属于“国史”。宋代郑兴裔在《广陵志·序》中说:“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元代杨敬德在《赤城元统志·序》中说:“郡秉古侯国之史。”杨维贞在《至正昆山志·序》中说:“金匱之编,一国之史;图经一郡之史也。”这种方志是史的观点,更为明代方志学者普遍接受和论证,大量反映在其编纂的方志序跋、凡例之中,如《皇明天长县志·后序》:“夫志一方之史也。”《万历河东运司志·序》:“夫志,史乘之流也,古昔家有乘,国有史,今郡邑亦各有志。”《武定州·序》:“志也者,邑之史也。”《九江府志·序》:“夫志史之翼也。”许多私家目录也将方志从地理类中分离出来,成为史部独立的一类。如朱睦㮮编《万卷堂艺文记》史部有13类,其11为“方州之志”,录方志近200种,是为方志独立存目之始。随后又有祁承㮮的《淡生堂藏书谱》、汪宪的《振绮堂书目》等,也都如此分类。

(二)认为方志是地理书。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说:“九州土域,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一方,若弘盛之《荊州记》、常璩之《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理书也。”颜师古也说:“中古以来,说地理者多矣,或解释经典,或纂述方志。”宋代王象之在《輿地纪胜》序言中说:“世之言地理者尚矣,郡县有志,九域有志,寰宇有志,輿地有记。”元代黄潜甫在《东郡志·序》中也说:“昔之言地理者,有图有志。”历代公私书目,也多把方志归为地理类,亦是这种观点的反映。如

《隋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以及梁阮绪《七录》、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郑樵《通志·艺文略》、明焦竑《国史·经籍志》等,都是将方志归为地理类的。

除上述二种说法外,还有一些学者主张方志为政书。如明代林魁认为“志者,言治之书也,夫纪垂成远为治计也。”(《龙溪县志·序》)雍澜也认为“志也者,经治之书也,匪司政者有经治之材,而载笔者有经治之识不足以与于斯”。(《平和县志·序》)

三、论其功用

早在古老的《周官》一书中便已述及当时图、志的功用,如“职方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邑、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土训掌道地图,以昭地事”。秦、汉至隋唐,论述方志功用者代不乏人。唐刘知几作《史通》,对当时的郡书、地理书、都邑簿3种地方文献的功用,分别作了分析。他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地理书,“九州土宇、方国山川、物产殊异、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都邑簿,“帝王桑梓,列圣遗尘,经史之制,不恒厥所。苟能书其轨则,可以龟镜将来”。他认为方志有褒扬一方人物,辨明一方风土及龟镜将来之功用。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公然声称,修志就是为了“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此后,大规模的修志实践提高了对方志功用的认识,纂修《景定建康志》的马光祖、周应合鲜明地提出“补世说”,认为“天时,验于岁月灾祥之书;地利,明于形势险要之设;人文,著于衣冠礼乐、风俗之藏否;忠孝节义,表人才也;版籍耗登,考民力也;甲兵坚瑕,讨军实也;政教修废,察吏治也;古今是非得失之道,垂功鉴也。夫如是,然后有补于世”。先后主修《合肥志》、《广陵志》的郑兴裔概括方志有三大功能,①存史功能。认为“郡之

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其重典也。”“身虽不下堂阶”,而一地大概皆“恍然在目”。②资政功能。认为一地有志书,则“郡之中所为山川之广袤,守得而考之,户口之登耗,守得而询之,田畴之荒治,省得而省之,财富之赢缩,守得而核之,吏治之臧否,守得而察之,风气之贞淫,守得而辨之。守之奉命而来此也。所以上报天下,下顺民情者綦重矣。夫事不师古宜今,而欲有为,譬之闭门造车,未见其合,志曷可废乎?”③教化功能。认为方志载当地“嵩岳降灵,勋名成于仕宦,山川毓秀,贤声著于乡邦,千秋之俎豆增光焉。若夫遇名山而歌咏,掷地金声,历馆阁而抒辞,光天藻彩,邹、枚、鲍、庾之徒,赤赤在人耳目也。他如邾股砥纯孝之行,断指凜冰霜之节,可以立懦廉顽,风兹百世,旌庐表墓”。后世学者亦多从存史、资政、教化这三个方面论证和阐述方志的功用。元代黄潘认为方志有“图以知山川形势地之所生,而志以知语言土俗博古久远之事”,“凡皆达于朝廷,而关于政令,不特以资学士大夫泛览而已”。他还指出方志有教化、存史功用,“文献有足征者,宜其为书纂辑也备,考据也精,所记人才消长,风俗盛衰,上可以明教化之得失,而裨益乎治道,古今文华事实之故,下可以俟采录而垂之无穷,岂托于空言以为著述者,可同日而语哉!”明代李登在万历《上元县志·后序》中说:“志有三要焉,一曰经政,二曰观风,三曰考艺。”周瑛在弘治《兴化府志·序》中指出方志的功用为“修正立事,济人利物,移风易俗。”

四、谋其体例

古代方志学者十分强调方志体例的重要,重视“发凡起例”。唐代刘知几认为“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宋代郑樵在《校雠略》中也说:“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类例即分,学术自明。”马光祖、周应合在《景定建康志·修志本末》中说,修志过程必须做好四件事,将“定凡例”列为首

要,用以确定志书的体例结构、编纂方法及门类设置。随着修志实践的发展,历代学者对于方志体例的探讨和追求,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沿着继承和发展的道路而体例愈臻严密。志书体例的理论探讨大多由志书的凡例、志目予以体现。宋明以来,志书普遍有凡例,对于把握体裁,以志为主,横排门类,纵贯时间,结构完整,篇目有序,时空界限,详略范围,行文规则等皆有规定,成为确保志书体例统一的法则。然并不陈陈相因于前志,而不断有所创新,如陈洪谟纂《嘉靖常德府志》在体例上打破旧志平列分目的惯例,采取设志、目二级的方法,志下设目,条分缕析,层次分明;并且打破旧志的“天章冠首”,不在卷首列“皇言”、“诏谕”之类的文章;一反当时“首重天文”,以“星野”排头的作法,开宗明义以“沿革”作为篇首,纵述常德古今地域及其变化。作者说,府志“首中以地理,继之以建设;有人必有养,继之以食货;有养而后教立,继之以学校;教立则礼可兴,继之以祠祀;治民事神,有司是任,继之以官守;文事武备相须,继之以兵防;地以人胜,虽所产不同,皆山川所钟,继之以人品”。从理论上论述这种安排是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和内在逻辑联系,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古代方志志体程式精彩纷呈:平目体、纲目体、纪传体、编年、三宝体、政书体、两部体、三书体等,各有所长,各有特色。这些志体的形成,无不源于方志学者对于方志理论的探讨和追求,每一种体式都代表和反映了一家之说。如明代陈棣《嘉靖广平府志》首创两部体,以经纬分体,上下两大部类,经类包括封域志、郡邑志、山川志、建置志、学校志、书籍志、坛宇志、古迹志;纬集有官秩志、选举志、宦业志、贤行志、列淑志、恩泽志、经历志、风俗志,间以图、表。陈棣在序中表述了此种设计的理论依据,所谓经者,“自封域以至古迹,皆形质疑定之目,所列者在物,乃主也,静也”。所谓纬者,“自官秩以至风俗,皆运动推动之号,所取者在事,乃宾也,动

也”。又云：“经纬者，两仪之象也；一图者，太极之体也；三表者，效三才也；十二纪者，十二时也。对待有相配之体，禅继有相生之序。”此体虽不久传，终不失为一家之说。

五、规其章法

关于方志的章法，即撰写的一般要求，向为古代方志学者所重视。在论述中首重“求实”，这不仅散见在方志的序跋中，而且集中对旧志的评论和批评中。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后贤志序中说：“善志者述而不作，序事事实而不华。”唐代颜师古在《汉书·地理志》注中说：“中古以来，说地理者多矣，或解释经典，或撰述方志，竞为新异，妄为穿凿，安处附会，颇失其真。后之学者，因而祖述，曾不考其谬论，莫能寻其根本。”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序》中说：“尚古远者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元代许汝霖在《岷志》自序中批评宋代高似孙所撰《剡录》“择焉不精，语焉不详”，“纪山川则附以幽怪之说，论人物则偏于清放之流。版图所以观政理，而仅举其略；诗话所以资清淡，乃屡书不厌；他如草木禽鱼之沽，道观僧庐之疏，率皆附以浮辞而过其实”。反映了他选材宜精，详略要当，反对虚妄怪诞，厉行朴实质直的修志主张。康海在《朝邑县志·序》中也说：“志者，记也。记其风土文献之事，与官乎斯土者，可以备积其改革，省见其疾苦，累行其已行，察识其政治，使天下为士大夫者读之足以兴，为郡邑者读之足以劝，非以夸灵性之迹，崇奖饰之细也。”说明方志记之不实，难以发挥其资政、教化之功用。明代《嘉靖曲沃县志》主修者刘鲁生提出志书的书写标准应是“其载欲细，其事欲核，其书欲直。”就是说：记载要尽其所有，无所不包；事实要仔细核对，翔实确凿；对是是非非要敢于秉笔直书。他还提出志书的编纂原则是：“必广询博采，而后无遗迹；循名责实，而无讹传；义正辞严，而无赘语；类序伦分，而后无乱章。”

六、议其人才

名志出自名家。古代方志学者对于方志编纂的人选多所论重。宋代《新安志》的作者、进士出身的罗愿说：“夫所记山川道里者，非以言广也，务知险易不妄戒也；其录丁口顷亩，非以览富厚矣，务察息耗繇夺也；其书赋贡物产，非以给嗜欲也，务载阔狭同民利也；至于州土沿革，吏治得失，风欲之恶美，与其人材之众寡，是皆有微旨，必使涉于学者纂之。……若直抄取计簿以为书，则吏之善书者，足以次之矣，其施于事亦然。若直据令甲以为治，则凡吏之母害者足以听之，盖世常以为此无事乎儒，而儒亦卒不可废于世也，岂特此哉。”他反对把方志简单地变成资料汇抄，主张志书为著述之书，编纂者必须学问渊博，用自己的观点对资料进行选择、考证，则必须得其人而为之。宋周波在《清波杂志》中说：“近时州县皆修图志，志之详略系夫编摩者用力之精粗”，也强调“志在人为”的道理。明代黄仲昭编纂《八闽通志》，说：“我的力不能胜衣，而心欲负九鼎，我的官不逾九品，而视金、张（金日磾、张世安，皆为汉朝高官贵族）为无物，我的学术未究乎一经，而妄意颜、孟为师。”意在编一部好的志书非有远大志向和刻苦的治学精神是不可能办到的。他死后，有人给他作墓志铭，写了这样两句话：“腹则百氏，志则千古”。赞扬他在《八闽通志》编纂中取得的成就。

这些经验之谈、心得之论、学术之见，为清代方志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二、清代方志学的建立

一、清初学者对方志学理论的研究

清朝是我国古代方志发展的兴盛时期，自顺治起，即仿效前朝功令下昭修志，康熙、雍正先后开馆编修《明史》和《清一统志》，命督抚各修省志，府州县亦修志，以备采择。雍正还颁发了各省府州